

西夏研究丛书

西夏志略校证

胡玉冰 校注

甘肃文化出版社

304

西夏研究丛书

西夏志略校证

胡玉冰 校注

【甘】新登字第 09 号

西夏研究丛书

西夏志略校证

胡玉冰 校注

责任编辑:温雅莉	装帧设计:秋子 陈珂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制:甘肃地质印刷厂
社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316 号	厂址: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
邮政编码:730000	邮政编码:730060
电话:(0931)8811015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字数:125 千	印次:1998 年 6 月第 1 次
印张:5.125	印数:1—1 000 册
书号:ISBN 7—80608—381—2/K·62	

定价:13.80 元

出版前言

西夏,自公元 982 年立国,到 1227 年被蒙古所灭,历时 246 年。在近两个半世纪里,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西夏民族,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极富特色的区域性民族文化——西夏文化。

然而,由于西夏地处边鄙,远离中原,加之战祸频仍,大批的西夏文物典籍又被西征的蒙古军士付之一炬,尤其外强劫夺并秘藏海外,致使文化遗迹、遗物、艺术等在国内的留存甚微,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难解之谜。

近年来,一批有志于西夏研究的中国学者,尤其西夏研究所和宁夏大学的不少专家、学者们,面对历史资料十分有限的条件,披荆斩棘,备尝艰辛,开展研究工作。不仅撰著出版了一批颇有见地的西夏学研究专著,逐步揭开了西夏的神秘面纱,而且于 1995 年成功地举办了首届国际西夏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为支持、鼓励西夏学学术研究事业,我社在 1995 年编辑出版了“西夏研究丛书·第一辑”之《西夏文化概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学概论》、《西夏书事校证》、《西夏王陵》等五本专著的基础上,这次又抽资

出版《西夏天盛律令研究》、《西夏经济史研究》、《西夏志略校证》、《西夏纪事本末》、《西夏道教初探》等“西夏研究丛书·第二辑”。再过两三年,如像《西夏美术史》等成稿时,我们还有望出版不可或缺的“第三辑”、“第四辑”……以给关心和支持西夏学研究的仁人志士和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8年5月16日

校证说明

一．鉴于本书成书的特殊情况，校勘以对校为主，凡所征引之语言文字，力求与原书保持一致。原书无目录，今仿《西夏书事》例增补。

二．对照征引原书，底本明显有误者径改，不出校记；异体、俗体等字体写法歧异者，以通行体为准，改归一律，不出校记。

三．凡引文中属史实上的舛误，或易生歧异的脱讹衍倒，一律补证，出校说明；底本疑有脱讹衍倒而无坚实根据者，出校存疑，底本不改。

四．底本引文所据版本与今通行本有不同，底本不误而今本误者出校说明。

五．纲、目俱误，纲中径改，目中出校说明；行文前后出现相同错误者，于首见处出校，余皆径改，注明“参见某卷某条校记”。

六．夏、辽、金、元及吐蕃、回鹘等古代民族族名、人名及地名等因音译而写法不同者，不出校，有疑误者出校说明。

七．格式依抄录原书：每纲顶格排印，加标1、2、……等号码以保存原书分段原貌；目低一行，空二格排印；每段引文后都注明出处，注出书名、卷数，宋人笔记加注朝代、著者名，校证者所注出处加括号，以示与正文有别；纲中年号纪年后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以便寻检；原书双行夹注改排单行，以小五楷字体区别于正文。

八．校记标号(1)、(2)……标在一句之末。校记置于卷末，参校各书沿用简称，异文一般不录，注明参见书名、卷次。史实有疑

误，不录原文，加“按”；字数较多之误，只录首末两句。

九．校勘中吸收了今人的研究成果，在此致谢，恕不一一注明。

《西夏志略》考略(代序)

《西夏志略》(以下简称《志略》)作为一部汉文西夏史籍,由于传世本不著撰人名氏,原书亦无序跋,因而在被学人论及其撰书缘起、撰著人、成书年代等问题时众说纷纭,它的成书之谜至今未被彻底解开。通过对《志略》一书进行详实考证,笔者认为,该书不是一部由学者独立撰写的学术著作,它其实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史书,它是学者将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①和大型典制体史书《续通志》^②中的西夏史料依原貌(包括内容和格式)抄录出来,合二为一,冠以新书名行世。由于资料缺乏,年代久远,《志略》抄录人已不能确考,其成书年代据考证当在清嘉庆十四年(1809)至道光九年(1829)二十年间,成书原因主要是受乾嘉补史之风的影响。具体考证如下,请大方之家指正:

一、对《志略》的著录与收藏

《志略》主要见载于以下几种著作中:

① 《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编纂、蒋廷锡校记,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10月出版。

② 《续通志》,清乾隆敕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一)清瞿世瑛《清吟阁书目》^① 卷一载:“《西夏志略》,四本。”按:瞿书卷一所载均为钞本,四本或即四册,具体卷数不详。

(二)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② 史部卷五《载记类》载:“《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旧钞本,后有何元锡印、梦花馆藏书印各一方。”按:梦花馆(一作梦华馆)为清人何元锡藏书馆,孙氏著录最为详明,为后人考证《志略》的成书与传布情况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

(三)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西夏史料》^③ 载:“〔清〕《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旧钞本,梦华馆藏。”按:从著录的内容来看,邓说盖袭自《贩书偶记》。

(四)吴天墀《西夏史稿》^④ 附录四《西夏史文献目录》载:“《西夏志略》四卷,又《载记》二卷,未见,〔清〕无作者姓名,孙殿起《贩书偶记》卷五谓系旧钞本,后有何元锡梦华馆藏书印一方。”按:吴先生著录内容亦未增添新的材料,且著录有二误:《志略》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日本亦有传抄本,吴先生言“未见”,此其误一;孙氏载《志略》后有藏书印两方,印文分别是“何元锡印”、“梦花馆藏书印”,吴先生合二印为一印,此其误二。

除上述著作著录外,日本学者冈崎精郎 1963 年发表了《关于西夏史籍的研究——兼论〈西夏志略〉》^⑤一文,他在文中主要介绍了见藏于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的《志略》的版本及内容情况,该书系大阪大学于 1950 年从日本文求堂购入,一函八册,

① 《清吟阁书目》,四卷,清瞿世瑛著,见民国七年(公元 1918)吴昌绶辑《松邻丛书乙编》第十册。

② 《贩书偶记》,二十卷,孙殿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第一版。

③ 《中国边疆图籍录》,邓衍林编,商务印书馆 1958 年 4 月第一版。

④ 《西夏史稿》,吴天墀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 月第二版修订本。

⑤ 冈崎精郎之文载日本开明堂昭和 38 年(公元 1963)版《岩井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

六卷,抄本,不著撰人名氏,无序跋。文求堂曾大量搜购过中国善本古籍,《志略》如何辗转被其购入,文中未作交待。冈崎先生在文中还介绍了他所知见的两部著作对《志略》的著录情况,现转引如下:

A、《旧满洲国外务局政务处·外政五·第四号·西北问题汉文图书目录》第6页载:《西夏志略》四卷,附载记三卷(冈崎按:三为二之误),不著撰人名氏,抄本。

B、《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史部·载记》条载:《西夏志略》一函六册,不著撰人名氏,抄本。

冈崎先生分析这两种著录时说,A本册数不明,B本是六册,但卷数不明。

赵志坚、褚晓明二位先生在他们合写的论文《北京地区所藏西夏学文献专题书目》^①中对《志略》也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他们说:“《西夏志略》,不分卷,书无序跋,作者无从查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手抄本,开本、册数各不相同,均抄自同一蓝本。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有藏。”按:赵、褚之说涉及到了《志略》的编撰体裁及国内收藏情况,这在《志略》著录中还是第一次,但他们的说法过于含糊,说《志略》“不分卷”更是与事实相背。

据西夏学专家白滨先生考证^②,《志略》传世藏本均为手抄本,各藏本册数虽有不同,如中央民族学院藏本为一函四册、中科院考古所藏本为一函十册、民族文化宫藏本为一函六册、日本藏本为一函八册,但各藏本内容、体裁及抄写格式均完全相同,卷数同为六卷。册数不同纯属装订需要随意所致,非有意为之。由此推知,《志略》所有传世本均源于同一蓝本。白先生考证甚确。

综合以上分析,对现存的《志略》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作出这

① 赵、褚之文载于《宁夏图书馆通讯》1981年第3期。

② 参见白滨《〈西夏志略〉考》一文,载于《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样几点概括:第一,传世的《志略》均为手抄本,未见刊印本传世,抄本内容共六卷,其中载记二卷,无序跋,不著撰人名氏,具体撰著年代不详;第二,《志略》在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国外日本有藏,各藏本册数互异,但内容、体裁及抄写格式、卷数均相同,可推知抄自同一蓝本;第三,所有传世抄本都未见有“何元锡印”、“梦花馆藏书印”两方印章,可见何氏梦花馆所藏《志略》已亡佚。

二、《志略》内容、体裁与格式特点

既然《志略》传世本均抄自同一蓝本,我们就以民族文化宫藏本为例,来对这本史书的内容、体裁及格式特点作一分析介绍。

文化宫藏本原藏于国立新疆文化教育馆,一函六册,卷一分上下两册,卷二、卷三、卷四各一册,《载记》卷五、卷六合为一册,共204页。从卷一“仁宗天圣九年”条可以看出《志略》分册的随意性:此条完整的“纲”应该是“仁宗天圣九年,赵德明卒,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其子元昊自立。”文化宫藏本分册装订时,该句前20字属上册,后6字属下册,一条完整的纲被随意割裂。

从内容上看,《志略》前四卷与后两卷有重复之处,从史书体裁看前后两部分也没有统一,抄本格式前后也不相同。兹分述之:

《志略》前四卷以编年纲目体的形式记载了自唐懿宗咸通末年(873?)平夏部拓跋思恭自称刺史至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西夏国亡约354年的历史。从各卷内容看,卷一起唐懿宗咸通末年平夏部拓跋思恭自称刺史事,尽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春正月赵元昊寇延州事;卷二起仁宗庆历元年(1041)春二月元昊寇渭州事,尽英宗治平四年(1067)冬十月知青涧城种谔复绥州事;卷三起神宗熙宁元年(1068)春三月夏主谅祚卒、遣使告哀事,尽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故辽大石假道于夏以伐金,诏利西都统制置使议便宜事;卷四起光宗绍熙四年(1193)夏主仁孝殂,子纯佑嗣事,尽金哀宗正

大四(1227)夏国亡事^①。卷四后还附有《宋史·夏国传论》、《金史·西夏传赞》及《西夏杂录》(包括宋人笔记《东轩笔录》卷15、《后山谈丛》卷4中记西夏事)。

《志略》前四卷用编年纲目体的体裁形式叙述西夏国事。这种史书体裁创始于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编年纲目体有它固定的格式,叙事以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为便于人们阅读并掌握要领,每叙一事,先依年次标列内容提要,以大字顶格排印,此为纲,然后转行另起一段,以小字顶格排印,详细叙述具体史事,此为目。这样纲目结合,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志略》前四卷也继承了这些特点。另外,又根据它的具体情况,做了适当的变通。因为是手抄本,纲目字体大小一致,这与刊印本不同。抄本行款为,每半页9行,行20字,由于抄写时发生错倒衍脱等现象,行字数偶有增减一字者。由于内容提要并没有涵盖目中所有的内容,纲一般只举首年发生之事,因此《志略》纲与纲之间的年次编排上呈现出跳跃性,如卷一,在“真宗咸平元年春三月”条后,接排的纲编年为“咸平四年秋九月”,中间跨越了两年。

《志略》目中所用史料均节录原文,前四卷取材以纪传体史书(即传统所说的正史)为主,主要节录了《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四史帝王本纪、人物列传中与西夏历史有关的部分,对宋、辽、金三史的西夏国传更是全部征引。此外,前四卷还十三处征引了九种宋人笔记中所记西夏事,这九种笔记是(依文中征引先后排序):沈括的《梦溪笔谈》、孔平仲的《谈苑》、魏泰的《东轩笔录》、苏辙的《龙川别志》、王巩的《闻见近录》、叶梦德的《石林燕语》、张舜民的《画墁录》、苏轼的《东坡志林》、陈师道的《后山谈丛》。其中《梦溪笔谈》征引了四次,《东轩笔录》征引了两次,余各征引一次。目中所引史料均注明出处:纪传体史书注明书名、篇名,引自同一史书

^① 参见本书卷四校勘记(32)条。

者于《本纪》前注书名,以后引各《列传》仅注篇名,书名省去;宋人笔记仅注书名。引文排列次序为:帝王本纪、西夏国传、相关的人物列传,宋人笔记置于最后。《志略》的内容提要即“纲”在内容上一般依从本纪所载。若纲之所言与某史某帝王本纪或列传记载相同,目中则用“按某史某某本纪云云”或“按某某列传云云”的格式来代替具体内容;有纲所不能涵盖的内容,目中则在“按某史某某本纪”的格式后补充叙述。纲之所言若不为本纪所载,目中则用“按某史某某本纪不载”的格式来交待。引自同一史书的本纪、列传,不另起一段,只在每段引完处空一格,下面依“按某某传”的格式接叙。引书不同,要另起一段,顶格书写,注明书名、篇名。其它格式不变。卷三有处比较特殊,与全书格式稍有不同,在“绍兴十四年”至“绍兴十八年”五则纲目中,先依次排“纲”,最后用一则“目”总括为“按:以上《宋史·高宗本纪》不载。按:《夏国本传》云云。”

据笔者统计,《志略》一至四卷共列纲目 131 则,其中卷一 28 则,卷二 10 则,卷三 54 则,卷四 39 则。纲目引文全引唐史者有 2 则,全引宋史者有 96 则,全引金史者有 33 则。另外,还八处引辽史、十一处引八种宋人笔记都附在 96 则全引宋史的纲目之后。两处引两种宋人笔记附在 33 则全引金史的纲目之后。

《载记》卷五、卷六用人物列传的形式记述了西夏立国前后十六位重要人物(主要是国君)的生平事迹。卷五记李彝兴(西夏国彝兴前的历代先祖如仁福、彝超等人的事迹附在彝兴传中)、克睿、继筠、继捧、继迁、德明、元昊、谅祚等八人生平,卷六记秉常、乾顺、仁孝、纯佑、安全、遵顼、德旺、睨等八人生平。

《载记》取材以宋、金、辽三史夏国传特别是《宋史·夏国传》为基本史料。与前四卷节录原文不同,《载记》主要是化用原文,即编撰者用自己的语言对史料进行重新组织。另外,卷五还有十一处夹注,卷六有九处夹注,多引正史史料,对载记中的人名、地名及某些史实加以考证,或补正史之阙,或纠正其谬。夹注共有七次引正史

之外的其它史书来考证,引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各一次,引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三次,钟渊映《历代建元考》两次。

《载记》抄写行款为,每半页8行,行21字,由于手抄的缘故,行字数偶有增减一字者。五、六卷内容各分成八段,以标题所列人物为单位,每人事迹为一段,开头均顶格书写。夹注用双行小字的形式处理,附在需要考证的正文之下。除夹注注明史料出处外,其正文所引史料均未注明出处。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志略》前四卷与后两卷在内容、体裁及格式特点上都存在着极大差异,特别是在涉及到西夏、辽、金及吐蕃等各族族名、人名、地名时,实为同一族、同一人、同一地的,前后两部分却用不同的音译名称称呼。如卷五“继迁”条载“巴喇济遽集六谷蕃部及哲伯族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卷一“景德元年春二月”条在叙同一件事时,引《宋史·夏国传》,“巴喇济”作“藩罗支”,“哲伯族”作“者龙族”。这说明,《志略》前四卷与后两卷在叙述相同的史事时,取材的依据有很大的不同,史料或者选自不同的史书,或者选同一史书的不同版本。全书编撰没有统一的体例,前后史学体裁不同,这在由学者一人独立完成的史学著作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志略》前后两部分是由不同的人,依不同的编撰体例,按不同的史学体裁、不同的指导思想编撰而成的。考证的结果也证明了《志略》是一部二合一的资料汇编之作。

三、《志略》成书二合一

据笔者考证,所谓《志略》不像有些学者猜测的那样是由学者独立撰著的史学著作,它是学者将两部大型工具书《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和《续通志》中西夏史料汇编部分抄录出来,

内容上未作任何改动,只在格式上稍加改变,然后合二为一,冠以《志略》之名单行于世的。

《集成》是康熙时由陈梦雷、雍正时由蒋廷锡等先后主持编纂而成的,有正文一万卷,目录四十卷,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分成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志略》前四卷抄录自《集成·方輿汇编·边裔典·西夏部汇考》。《集成·凡例》在介绍“汇考”这种编撰形式时说:“汇考之体有二:大事有年月可纪者用编年之体,仿纲目立书法于前,而以按某书某史详录于后,事经年纬,而一事之始末沿革展卷可知;立书法于前,详录诸书于后,则一事之异同、疑误参伍可得。此典中最宏巨者也。”从我们对《志略》体裁的分析看,前四卷正具备了这些特点。《志略》一至四卷即《集成》卷79至卷82《西夏部汇考》一至四部分,二者在内容上完全相同。《志略》对《集成》的格式略有省改,主要表现在对小标题和小标题后纲目则数的统计数的省改上。这种省改分有意省去和无意抄脱两种类型。《西夏部汇考》一至四分别在《唐》、《宋一》、《宋二》、《宋三》、《宋四》、《金》的小标题后,有对所列纲目则数的统计,如在卷一《唐》的小标题后附有“懿宗咸平一则、僖宗中和一则”纲目则数的统计,卷二在《宋二》的小标题后,附有“庆历五则,嘉祐三则,英宗治平二则”的纲目则数统计,《志略》对这样的则数统计全部有意省去。小标题除卷一保留了《唐》、《宋一》原题外,小标题《宋二》、《宋三》、《宋四》分别在卷二、卷三、卷四中均无意抄脱为《宋》。另外,《西夏部汇考四》后原附有《西夏部艺文》(包括《宋史·夏国传论》、《金史·西夏传赞》)和《西夏部杂录》两个标题和内容,《志略》卷四只全部保留了内容,却将第一个标题抄脱,第二个标题抄脱一个“部”字。

《续通志》是一部典制体史书,六百四十卷,乾隆三十二年开始奉敕编修,编撰体例基本仿南宋郑樵的《通志》,内容上承《通志》,主要记五代至明末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以及经济、文化发展

情况,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志略》卷五抄录自《续通志》卷604《载记十一·西夏上》,卷六抄录自《续通志》卷605《载记十二·西夏下》。《志略》卷五、卷六仅省去《载记·西夏》这样的小标题,其余内容与格式皆完全照抄《续通志》。《续通志》双行小注明显多于《集成》,对双行小注,《续通志·凡例》是这样说明的:“至正史之外,间有可补正史之阙而纠正其谬者,仍广为搜罗,依类增辑,并仿司马光《通鉴考异》之例,将考正异同分注本条之下,以资参考。”把西夏国史编入“载记类”,反映了封建的正统史学观点。作为与宋、辽、金三朝并存的一个王国,西夏从未被承认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它一直被历朝统治者视为是一个割据政权,认为它“虽受命中国,阳奉正朔,但割据偏方,各君其王,和僭伪相若”^①,所以西夏国史也就未能在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一席之地。《续通志》由于是清朝官修的史书,也是“钦定”的,在对待西夏国史的态度上,编修者自然也要秉承正统的封建史观。做为大型资料汇编性质的工具书,缺少西夏史部分,必将影响到该书的权威性及编选资料的全面性,因为西夏国的存在毕竟是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如何“摆正”西夏国史在“钦定”的史书中的位置,《续通志》的编修者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最后西夏国史被放在了“载记类”(专记割据政权历史)中,编修者这样做的理由是:“至夏国世有西土,历宋、辽、金之际,虽服事朝廷,而徇向不常。考德明于祥符间已追帝其父,逮元昊乃始显称,厥后因之,此当为僭国,而不得为外臣也。《辽史》列为《外纪》,宋、金二史入之《列传》,今并改入《载记》,附十国后,庶于通史体例为得云”^②。看来,清人“卫道”的意识要远远高于元人。这样一来,既没有违碍正统史学观,又能使西夏史在钦定史书中有了“合适”的位子,从而也保证钦定史书的权威

① 参见《续通志》卷594《载记一》。

② 参见《续通志》卷594《载记一》。

性、全面性,可谓一举两得。

经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基本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志略》是部二合一之作。这除了表现在内容、体裁和格式上之外,还表现在《志略》“忠实”地承袭了《集成》、《续通志》本身的错误上。由于此二书只是一种分类的材料汇编,不是什么学术著作,它们成于众手,编撰时间又仓促,因而书中错误很多。特别是《集成》,在节录正史材料时,缺乏严格统一的节录原则,故往往出现割裂原文、断章取义的现象,甚至以概叙、撮述代替原文,这在对节录内容的概括——“纲”中表现尤其明显,这些不仅违背其自身的编撰体例,对使用者来说,也容易是非混淆。《志略》又属辗转传抄之作,抄写粗疏,抄录者又未能核对原书,除继承原有错误外,又增添了许多新的错误。对这一问题可参见本书校勘记,此不再一一举例。

《志略》这种特殊的二合一式的成书方式到底是何人所为?成书原因是什么?《志略》最后成书又是在什么时候?由于参考资料和个人学识所限,对这几个问题我们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探讨。

四、《志略》成书原因、年代及抄录者小考

笔者认为,《志略》成书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受清乾嘉时期补史之风的影响。乾嘉时期,补史之风大盛,西夏国史成为众多史学家补写的对象,这一时期出现了这样一些西夏史著作:洪亮吉的《西夏国志》(未有成书)、周春的《西夏书》(有残本传世)、秦恩复的《西夏书》(积稿早毁)、王昶的《西夏书》(未知有无传本)、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存)、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存)等^①。《集成》、《续通志》成书于康熙乾时期,受当时学风的影响,很可能有人将这两部工具书中现成的西夏史料汇编部分抄录出来,冠以新书名行世。第

^① 参见胡玉缙《西夏纪序》,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